

国外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 研究译文集

(第一集)

GUO WAI
ZHONG GONG
DANG SHI
ZHONG GUO
GE MING SHI
YAN JIU
YI WEN JI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科研局编译处



D23-
72

国外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第一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7.75印张 470千字

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ISBN 7-80023-296-4/D·39

定 价：9.70元

0429/10

出版说明

60年代以来，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进展很快，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资料，为了便于国内学者了解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状况，我们特编辑一套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丛书，将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点摘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等。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辑）主要收录了近几年国外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论著和资料（其中包括个别台湾学者用外文发表的文章），从内容上看，涉及对党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如党的创立、第一次大革命、遵义会议等）的评价，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述和对我国史学界还研究得很不够的一些课题的探讨，如台湾共产党政治史、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中国革命时期第三势力的形成和发展等。还有一些文章综述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其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不乏客观分析，当然也不都是正确的，甚至有一些偏见，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海副译审帮助选编，我室王洪模教授审阅了部分译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

1990年12月

目 录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苏〕П·Г·巴比琴科 马贵凡译(1)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苏〕Ф·И·菲尔索夫、К·К·希里尼亚 马贵凡译(20)

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系

……………〔日〕铃木昌之 张惠才译(36)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苏〕А·Б·列兹尼科夫 马贵凡译(62)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于共产国际1926年的

《十二月提纲》……………〔日〕松元幸子 韩凤琴译(75)

西安事变考——关于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

……………〔日〕石川忠雄 张惠才译(104)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

(1917—1921)

…〔苏〕А·И·卡尔图诺娃、Е·Ф·科瓦廖夫 马贵凡译(120)

论中国1925—1927年民族革命的历史地位

……………〔苏〕А·Б·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译(139)

台湾共产党政治史(1928—1931)

……………〔美〕弗朗克·肖、劳伦斯·萨利文 王应一译(152)

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

……………〔美〕吴英铤 唐秀兰译(177)

-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梁敬铎 唐秀兰译(223)
- 鲍罗廷回国以后……〔美〕丹·N·雅各布 唐秀兰译(244)
- 中国革命时期第三势力的成立与展开
 ……………〔日〕菊池贵晴 张惠才 韩凤琴译(263)
- 1931年中国的分裂在日军战略中的地位
 ……………〔美〕唐纳德·A·乔丹 韩 红译(309)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
 ……………〔日〕藤原彰 解莉莉译 张惠才校(336)
- 现代中国对陈独秀的研究
 ……………〔日〕横山宏章 韩凤琴 张惠才译(349)
- 一位广西共产党人的忧患生涯及其身后遭遇
 ——关于李明瑞和1949年以前广西共产党活动的几点
 札记……………〔英〕格雷厄姆·哈钦斯 张晓翔译(371)
-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澳〕尼克·奈特 王应一译(383)
- 河山肇与中国革命……………〔日〕小野信尔 张惠才译(391)

文 献 资 料

-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
 ……………马贵凡译 宋洪训校(395)

动 态

- 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现状…………〔日〕国分良成 王应一译(444)
- 日本中国革命史研究现状…………〔日〕天儿慧 韩凤琴译(457)
- 日本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
 ……………〔日〕井上久士 韩凤琴译(466)

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研究情况简介	
.....	[日]藤田正典 张惠才译(484)
各国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	[日]铎木昌之 张惠才译(492)
苏联学者对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研究	
.....	[苏]B·H·尼基福罗夫 马贵凡译(505)
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	[苏]A·B·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译(523)
西德现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简介	
.....	[日]中嶋岭雄 韩凤琴译(540)
中国近年来在毛泽东研究上的成就与问题	
.....	[日]村田忠禧 韩凤琴译(545)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 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苏〕Л·Г·巴比琴科

马 青 凡 译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7年第10期。作者Л·Г·巴比琴科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副博士。文章报道了这一年的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共产国际史研讨会情况，反映了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现状和苏联学者对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问题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的反思。

今年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历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得很不够和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来自莫斯科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就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状况和迫切任务，就克服停滞倾向、根除根深蒂固的教条和过时的模式发表了看法。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Г·М·阿季别科夫、Ф·И·菲尔索夫和К·К·希里尼亚；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А·А·加尔金和С·И·谢苗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科学院历史学博士、教授И·М·克利沃古兹；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И·Н·温达瑟诺夫和З·Н·雅希莫维奇；苏联科学院各民族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Я·С·德拉布金；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А·М·格里戈里耶夫；苏联

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П·Я·加比昂斯基。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博士М·П·姆切德洛夫教授致开幕词，他号召研究国际共运史的专家们集中力量研究共产国际历史中那些至今还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强调说，在今天，苏共二十七大决议和苏共中央一月和六月（1987年）全会决议已经为我国社会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广泛进行科学探索的许多障碍已经清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学者，包括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已经有实际可能记取真正的教训，完全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开展研究工作，重新考虑以前对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活动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个别队伍所作的一系列评价。

共产国际就许多问题（如工人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问题、结盟问题、对待中间阶层的态度问题、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问题等）所进行的大量理论探索，对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则需要对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改良派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共产国际的诸多方面活动，采取新的态度和进行认真的思考。我国对共产国际问题的史料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

姆切德洛夫指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我国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在研究共产国际活动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如出版许多重要著作，公布许多文件，等等。他强调，必须尽量借鉴已经积累起来的正面经验，因为以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这些成果所作的详细分析和批判性评价，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把对共产国际理论遗产的创造性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希里尼西指出，我国积极研究与共产国际活动有关的问题始于50年代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这期间，马列主义研究院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陶里亚蒂发表的纪念这个国际共产主

义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对加强这项工作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历史科学认真地研究了列宁在建立共产国际和在制定其战略和策略方面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列宁向一些共产党提供的巨大帮助。在对共产国际第一至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阐明了这些文件对于发展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在《共产国际史纲》(莫斯科1969年版)这部专著中分析了这个组织活动的主要战略阶段，着重研究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问题以及人民民主革命理论的产生问题。在研究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方面，以及在揭示季米特洛夫在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希里尼亚指出，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既有困难，也有严重的错误。在编写上面提到的《史纲》过程中，曾收到这个组织原工作人员的一些看法。如帕姆·达特指出，这部书第一次把评价共产国际活动的积极方面同十分坦率地承认它的消极方面结合起来了。确实，作者集体曾试图阐明共产国际的多样性经验，不仅要看到它的成就和功绩，而且要指出它的错误和不足，但是，这样做曾遭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某些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在更高一级层次上围绕该书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作者不得不从书中删掉许多说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产生影响的论点，不过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对问题的总的处理方法。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参加编写多卷本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也是对共产国际史作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

加尔金和德拉布金在发言中谈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集体在研究国际共运史学术问题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加尔金指出，Б·М·莱布索恩和К·К·希里尼亚的著作^①问世是一个新的前进阶段，它促进了对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广泛深

入研究。克利沃古兹认为，60—70年代是对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关于共产国际历史经验的总的概念。

但是，他们指出，那时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要求，需要采取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彻底地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历史进程。现在迫切需要这样做。

克服科研工作中的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

抛弃过时的模式

烦琐哲学、教条主义和过时的模式是在共产国际史研究中更为突出存在的问题，其表现是：讳言许多事实，回避尖锐问题或试图冲淡这种问题，力图从今天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共产国际活动的某些方面，用泛泛的议论代替具体的结论，使共产国际的历史失去个性。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这一科学领域的全面停滞。

克利沃古兹强调指出，必须摆脱使用史料的倾向性，抛弃“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会给客观的研究工作带来损害。只有克服所有这些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雅希莫维奇认为，苏联的历史著作对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成分，其表现是简单地阐述革命进程，形式主义地运用关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及其衰落和灭亡的理论原则。例如，20年代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它的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它已开始运用新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但是共产国际却一味固执地认为存在着似乎可以导致资

本主义迅速崩溃和灭亡的趋势。许多有助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当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和革命进程的不够发展造成的。

温达瑟诺夫指出，在我们的著作中实际上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国际制定的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常常用于削弱社会民主党。其实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拒绝同社会民主党组成战略联盟。拉狄克曾主张继续执行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但是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反对。直到法西斯在许多国家上台掌权的悲惨教训发生后，共产国际才不得不回到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上来。

温达瑟诺夫认为，共产国际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摆脱它在20世纪所陷入的结构危机的途径缺乏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日益得到发展的新的条件下，存在着三种摆脱危机的途径：革命的途径、改良的途径和所谓反革命的途径。后两种途径的结合占居主导地位。但是共产国际只认为有通过革命摆脱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它不可能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正确的态度。而且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时通过革命摆脱危机的途径是行不通的。结果第二半国际同第二国际合并，而左派社会党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是应当注意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在呼吁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派别团结起来。

温达瑟诺夫赞同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作出的许多肯定的评价，但是他认为，《共产国际史纲》一书对共产国际活动的分析很肤浅。这部书的观点是，共产国际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只是偶尔出现过失误或做得不够及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后来撰写的著作则深刻得多。温达瑟诺夫认为，现在学者们正处在研究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起点上，他们还受到一些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观念的沉重压抑。

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公式化的表现是，只承认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积极意义。据Д·З·马努伊尔斯基证实，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有50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撤换。

德拉布金指出，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出现了“卢森堡主义”这个提法，造成了不良影响。人们试图以“卢森堡主义”来掩盖当时共产党人所犯的几乎所有理论上的错误，试图证明“卢森堡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相近似。人们首先和主要强调的是杰出的女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的思想遗产中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蔡特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曾坚决反对、谴责卢森堡，不同意当时出现的这样一种看法：象卢森堡这样的活动家，越是接近共产主义运动，她的影响就越有害。攻击卢森堡的下一个步骤是斯大林（1931年）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已把卢森堡说成是不断革命理论的炮制者。德拉布金强调说，苏联历史学家需要深入研究卢森堡的创造性遗产，清除过去年代的积垢。

克利沃古兹对所谓学者们充分地研究了“列宁与共产国际”的问题的说法提出疑义。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还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作出分析，即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怎样全面贯彻列宁的思想？并且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列宁是否始终都能贯彻自己的思想？要知道，有时列宁在共产国际里处于少数地位，因此在共产国际里曾为确立列宁的观点进行过斗争，同时，列宁的观点也得到了发展。对待这个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更加认真的态度。

雅希莫维奇强调指出，共产国际历史中的列宁时期，是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理论问题方面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派”曾从所谓“进攻理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列宁的一系列思想，尤其反对统一战线思想。按照这个“理

论”，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共产党都要始终执行进攻策略。共产国际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当然以及1937年和晚些时候，都曾发生过背离列宁主义原则的情况，其集中表现是解散波兰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历史中存在着一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棘手问题是有关联的。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全面的、权威性的研究和思考。

加尔金指出，回避态度在政治上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损害。共产国际历史上的“空白点”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在许多场合，我们在思想敌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例如，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破坏民主原则的事实和干涉一些共产党事务的恶劣做法，都需要作批判性分析。但是这里并非全是一种涵义。要考虑到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组织，这一点不仅决定了它的积极因素，而且也决定了它的消极因素。比如说，共产国际往往把联共（布）的建党原则机械地搬到其他党内，而在我们的著作中，实际上只字未提共产国际的机构及其对各国党的影响。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外却有很多著述论及。现在不仅需要更广泛地揭示共产国际对培养干部和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积极影响，而且需要批判性地分析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造成的后果。

谢苗诺夫接着谈到研究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必要性，他注意到一直未作研究、实际上至今仍是研究禁区的共产国际各地区局、各区域性书记处和其他机构的活动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的地方，给资产阶级思想家、修正主义分子歪曲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很有必要阐明比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巴尔干局和南美局的活动和联系问题。同时应该看到，共产国际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各个国家进行活动，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和传播了积累起来的革命经验，鲍罗廷在研究了墨西哥的革命经验之后，曾试图将

其运用于中国。米涅夫曾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地区局的活动作出很大贡献。在研究各地区共产党活动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革命经验产生的影响。

菲尔索夫也谈到共产国际与它的各个支部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从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彻底性角度对这种关系作了分析。他指出，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著作谈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时犯错误和歪曲这一原则的原因。大家知道，共产国际常常给各国党下达无法接受的决定，在干部问题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们。其明显例子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波兰同志在对《共产国际史纲》一书所作的一则评论中委婉地指出，该书绕过了这个问题。

现在需要更清晰、更详尽地揭示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斯大林对制定这个组织的战略和策略的粗暴干涉，常常给各国党造成不良后果。对于在斯大林的压力下通过的文件，也应当作出适当的评价。但是不能仅满足于明确错误，因为诸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之类决定，是在政治上对斯大林镇压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掩饰。

菲尔索夫接着说，最近20年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其他国家对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批评，在苏联的著作中找不到类似的反映，而其评价与我们又不一致，那么这种批评就会遭到驳斥或被置之不理。例如，路易吉·隆哥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的战争》（他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一书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这部书，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983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菲尔索夫认为，П·列夫科维奇教授对共产国际的作用所作的评价是很准确的。列夫科维奇报告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或者说很接近。但是，南斯拉夫学者也提出另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无疑受到了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冲突的

影响。当然，应当批判那些站在敌对立场上撰写的、明目张胆歪曲历史的著作。但是必须放弃对外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作的一孔之见，不要摒弃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雅希莫维奇赞同这种看法。他指出，直到不久以前，对于那些研究国外论述共产国际历史的著作的学者来说，甚至在专门的通报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是很困难的。这不仅涉及否定的评价和结论，而且也涉及肯定的评价和结论。这种情况不能说是正常的。苏联读者应当了解国外如何阐述共产国际的历史。而且从对这些问题的史料研究过渡到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

格里戈里耶夫提请与会者注意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研究工作的活跃。在中国，最关心的是“共产国际中民族因素与国际因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等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如果说过去他们主要是进行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攻击的话，那么最近他们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已经比较客观了。

在前几年举行的苏中学者会晤中，中国学者确实接受了以下结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许多共产党经验的总结。共产国际事先并不知道发生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中国学者承认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和在1924—1925年，直至1927年的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要把共产国际的政策说成更有远见和比实际水平更高，则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政策中的首要任务，在当时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的。格里戈里耶夫强调说，摆在苏联史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既要说明共产国际东方政策中的成就，又要指出其中的失误，要填补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空白点”。

与会者认为，必须认真研究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对这个问题要采取新的态度。如希里尼亚指出，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弄清楚和重新作出批判性的认识。实质上，我们对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所做的有益工作还了解得很少。例如，1925年夏，以布哈林为首的俄共（布）代表团曾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中的极“左”派集团，即P·费舍、A·马斯洛夫等人进行了谈判。后来，布哈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了谈判情况。他批评德共领导不顾俄共（布）代表团的忠告和会谈时达成的协议，收缩工会中的工作，不让温和派代表进入德共中央（这些人在1923年曾是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在党内实行个人专制。俄共（布）代表团警告说，如果德共领导在党内建立强硬的个人专制关系，那么它必然会按照同样模式建立它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会使德共失掉同群众的联系。因此，布哈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了用能够执行列宁的密切联系群众政策的人来替换德共极“左”领导人的问题。希里尼亚指出，我们党向其他国家共产党提供建设性帮助的事例还很多。在揭露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时，不应忘记这些积极方面。必须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全部辩证的矛盾性。

谈到这个问题，菲尔索夫强调说，虽然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主导作用尽人皆知，但是学者们还没有根据具体事实对这种作用作出彻底的研究。例如，1921年1月，德共中央向德国其他工人组织发出公开信，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拉狄克的要求起草的，拉狄克也是该信的一个起草人。我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尽管在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拉狄克在当时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的。

阿季别科夫谈到一些学者喜欢对一些问题采取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态度，谈到他们跳出陈旧观点框框的胆怯心理。在分析与“共产国际和劳动者群众性革命组织”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